

德莱塞《嘉莉妹妹》中的疾病书写与人文关怀

李小涵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北京市, 100089; lxhhna@163.com)

摘要: 19世纪末美国《丑陋法》施行, 社会加剧歧视病患, 挤压流浪者生存空间, 同时美国社会妖魔化贫困, 恐老症蔓延。西奥多·德莱塞的《嘉莉妹妹》直面疾病、衰老、贫困议题。个人层面, 德莱塞书写了嘉莉的忧郁与其艺术生涯的关联, 以及赫斯特伍德的忧郁、衰老与疾病, 尤其关注个人疾病体验、社会因素的作用和病人的复杂情感, 极富人文精神。群体层面, 德莱塞既描绘了底层工人在恶劣环境中的病态, 又刻画了流浪者的虚弱病容和艰难处境, 揭露了政府慈善救济的缺位, 批判矛头直指美国上流社会流弊和贫富分化。德莱塞的疾病书写不仅关注个人情感体验, 更上升至社会政治批判维度, 传达着对贫弱者深厚的人文关怀。

关键词: 西奥多·德莱塞; 《嘉莉妹妹》; 忧郁; 衰老; 疾病

引言

德莱塞是美国自然主义小说巨匠, 他的作品在美国文坛开时代新风, 《嘉莉妹妹》作为其代表作, 百余年来吸引了批评界的诸多目光, 以往批评往往从消费主义、女性主义、空间视角切入, 鲜少关注小说中的疾病议题。而对《嘉莉妹妹》中疾病书写的探讨, 恰是全面理解小说意旨和德莱塞创作伦理的关键之门。将德莱塞的疾病书写置于世纪之交的美国社会现实与文坛风向中审视, 可观其政治批判的前瞻性与深厚的人文关怀。

在19世纪末期的美国, 疾病、丑陋、贫困的揭露仍存在表征难题。美国《丑陋法》(The Ugly Law) 首先于1867年在旧金山通过, 旨在“禁止街头行乞”, 以及禁止“患病、残疾、伤残者以及任何程度上的畸形者” [1] 出现在街道和公共场所, 继而全美各城市纷纷效仿。1881年, 芝加哥议员佩维 (Alderman Peevey) 向芝加哥议会提交法令, 更是直接以“街道障碍物”指称街头流浪者、乞丐等弱势群体 [1]。《丑陋法》的施行, 见证了疾病从单纯病症向道德批判的转换。疾病被赋予了丑陋、异常的隐喻, 使得患者因病蒙羞, 低人一等。将伤残患病者逐出公共场所的行为, 亦是对空间正义的践踏。美国社会歧视疾病、丑陋的同时, 贫困和穷人也污名化。社会达尔文主义风行, 就连当时的多数慈善改革者, 也将贫困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归结于“穷人内在的道德败坏”, 将贫困视为“病态的”, “危险的传染性疾病” [2]。而西奥多·德莱塞 (Theodore Dreiser) 的《嘉莉妹妹》(Sister Carrie 1900) 并未回避疾病、丑陋、贫困等议题, 在小说后半部分重点刻画了乞丐在内的流浪者群体的艰难处境和糟糕的健康状况。除流浪者外, 德莱塞同时关注了恶劣肮脏工作环境下底层工人的病态。除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和对贫富分化的批判, 德莱塞也倾注笔力于个人层面的疾病书写, 从嘉莉的忧郁与其艺术生涯的关联, 到赫斯特伍德的忧郁、衰老与疾病, 德莱塞重点关注个人的病痛体验、社会因素在其中的作用和病人的情感变化, 传达着鲜明的人文关怀与人文精神。

1. “忧郁的解剖”

疾病与艺术创作的关联在西方古已有之, 一个典型例子是19世纪上半叶浪漫主义思潮影响下, 结核病被视为贵族的“一种精神资本”和优雅浪漫、启迪人智的文人病 [3], 苏珊·桑塔格 (Susan Sontag) 曾论及文学界将悲伤忧郁与结核病等同的现象, “悲伤和结核病成了同义词” [4]; “只有生性敏感的人才能感受到悲伤”, “才能感染上结核病” [4]。忧郁作为精神疾病的强力催化剂, 是西方疾病史中绕不开的一环, 亦与西方艺术文化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忧郁与艺术创作的关联, 可上溯至古希腊。伪亚里士多德的《问题集》指出“忧郁者在教育、艺术、治国术的表现上不同于常人” [5], 此论点基于古希腊医学体液理论, 黑胆汁的过多过热导致疯狂, 使人诗艺更佳, 黑胆汁缓和下来, 疯狂就变为了忧郁; 这种亚里士多德式忧郁“会产生伟大的智力天赋” [5]。18世纪康德这样评价抑郁: “基于合理的厌倦而满怀忧伤地远离世界的喧嚣, 这是一种高尚的行为” [6]。忧郁是嘉莉的一大特质。面部特征而言, 嘉莉有着“富有同情心的大眼睛和哀婉动人的嘴

巴”[7] (p.710), “流露着动人的悲怆的口型”[7] (p.215)。就其情绪特征而言, 嘉莉多愁善感、容易共情, “脆弱的神经”[7] (p.51) 常使她情绪低落, “许多场面都会惹来她的悲伤—那些虚弱无助的人都会让她的心头涌上忧伤”[7] (p.216)。她未从事表演行业前, 先后依附于德鲁埃与赫斯特伍德, 常有迷惘愁闷之时, “郁郁寡欢”[7] (pp.84, 106, 490)、“自怜自哀”[7] (p.101)、“苦闷忧郁”[7] (p.453)、“悲伤痛苦”[7] (p.481) 曾是她常有的心绪, 而她忧郁悲痛的情绪在赫斯特伍德破产后达到顶峰, 哭泣成为她彼时的常态。德莱塞将嘉莉敏感悲悯的性格, 与其戏剧表演取得的成功联系起来, “这种性格一旦得到最大化的发展, 便成就了戏剧的辉煌”[7] (p.234)。从芝加哥第一次登台演出前, 嘉莉就“热衷于用剧中女主角哀婉的声调模仿传统的悲剧, 一遍遍地吟诵那些令她感动最深的伤感片段”[7] (p.234)。嘉莉亮眼的剧场首秀, 正是由于她饱含悲情地成功塑造了萝拉一角, 小说叙述者多次以“忧郁”[7] (p.270)、“悲伤地”描摹嘉莉心绪情态[7] (pp.276, 280), 这成功让她的表演极富艺术性和感染力, “感染力”(pathos)一词在描绘此次表演中出现三次[7] (pp.271, 276)。嘉莉后来在纽约剧团演艺事业的起色和转折, 也受益于她忧郁的情绪。一次排练时剧组经理留意到“嘉莉的忧郁”对其扮演的无台词角色“产生了奇妙的效果”[7] (p.652), 于是演出时她依照指令一直皱着眉头, 奇妙滑稽的效果最终赢得满堂喝彩, 助她一举成名。由于其“孤僻内向的性格”[7] (p.705), 成名后的嘉莉仍觉得“空虚寂寞”[7] (p.734)、“并不快乐”[7] (p.736), 在艾姆斯的鼓励下, 她将严肃的正剧作为自己未来的理想发展方向。

嘉莉的忧郁成就了演艺事业的辉煌, 反映出德莱塞对“天才的忧郁”传统的认同与延续。此外, 赫斯特伍德常见的发呆与感伤姿势: “两手托腮, 表情茫然”[7] (p.549); “手托下巴, 陷入沉思”[7] (p.628); “黯然神伤地倒在摇椅里, 一只手托着下巴”[7] (p.643), 与源于圣约翰悲戚形象的基督教传统忧郁姿势“一手支头(或手垫下巴)、神情沮丧”极为相似[5], 如此巧合或也出自德莱塞的有意设计。他对基督教信仰持复杂态度, 尽管他曾公开敌视罗马天主教在内的正统教义, “自称为有组织宗教的敌人”[8], 但其日记仍显示他定期参与教堂礼拜。对赫斯特伍德忧郁姿势的刻画, 显示出宗教传统对德莱塞创作根深蒂固、潜移默化的影响。

德莱塞笔下, 赫斯特伍德的忧郁与社会因素密切关联。国际医学人类学界代表人物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指出, 美国19世纪末的繁荣下, 由于不适应快速的社会变化, “歇斯底里忧郁性麻痹症、神经衰弱症、神经焦虑症等”成为“这个时代造成的凸显社会文化的病症”, 是“中产阶级中普遍流行的小恙”[9]。就连德莱塞本人, 在1902年试图潜心创作第二部小说时也曾患“神经衰弱症”[8]。纽约与芝加哥不同的生活节奏和人际圈层, 给赫斯特伍德带来了极大的心理落差和适应挑战, 其在纽约的生意不及预期, 逐渐陷入忧郁与焦虑。“社会因素常常会对疾病趋向恶化起决定作用”, 其中“社会因素包括生存严重受威胁、社会支持遭损害以及压抑的社会关系”[9]。赫斯特伍德在纽约结交的新朋友皆为酒色之徒, 使他失去了以往交游芝加哥知名人士的乐趣, 压抑的人际关系使他渐渐陷入了自我沉思与消沉压抑中, 他逐渐变得少言寡语, 慢慢失去了“招呼、讨好和认真招待这些来沃伦街酒店顾客的兴趣”[7] (p.485), 导致客流量减少, 进一步加重了他的忧郁状态。疾痛之下, “对病人来说, 社会生活不再那么至关重要”[9]。忧郁使赫斯特伍德对待他人有着“近乎让人不能理解的冷淡”[7] (p.581), 伤害了嘉莉的感情, 加速了二人间的离心离德。不和谐的人际关系加重了赫斯特伍德的忧郁, 而忧郁消沉又导致了其社会支持的进一步减少, 疾病与社会因素两者间形成恶性循环。忧郁加重, 赫斯特伍德出现了精神分裂症的症状, 常常幻听他昔日与芝加哥好友的社交与问候, “他静静地坐着, 低头发着呆, 渐渐地他感觉自己听到了昔日的欢声笑语和觥筹交错之声”[7] (p.631)。人际关系等社会印记已经深深烙印在赫斯特伍德的疾病经验中, 德莱塞将社会因素纳入个人疾病进程中的考量, 身体疾病由此联结着自我、他人与社会, 将个人疾病导向社会批判维度, 与当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对传统生物医学模式的补充、颠覆颇为合契, 显示出德莱塞社会观察的前瞻性和其深厚的人文关怀。

然而德莱塞对忧郁与生理疾病关系的处理却值得商榷。他就二者的关系作了如下评述: “终日压抑的情绪会使血液中产生一种叫破坏素的有毒物质, 就像愉悦和快乐的心情会产生一种叫生长素的有益化学物质一样。这种毒素是由悔恨和谩骂产生的, 并且侵袭着身体的组织系统, 最终会造成显著的身体体质恶化。赫斯特伍德正是这种反应的实验品”[7] (p.485), 在德莱塞看来, 忧郁直接导致生理疾病的出现, 这种情感病因的论述, 在十九世纪颇为流行, 桑塔格斥之为“站不住脚”[4], 认为此种荒谬危险的观点将患病的责任归咎于患者本人, 还可能误导患者, 使其拒绝接受医疗。德莱塞对病因的理解与归纳颇显片面, 暴露了特定时代下其认知短板。

2. 衰老与疾痛

19世纪末见证着美国的第三次移民高潮, 工业迅速增长的美国社会不断吸纳着新的青壮年劳动力。与此同时, 18世纪末开始的“青春热”和恐老症在美国各界蔓延[10], “十九世纪, 年老越来越被社会边缘化”[10]。恐老症和厌老情结也在文学界中得到了反映, 超验主义运动对19世纪及后世美国文坛影响深远, 其代

表人物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都对衰老持消极态度。爱默生曾表达其对老年的憎恶：“自然厌恶老年人，老年似乎是唯一的疾病；其他所有都可归于此类”[10]。梭罗在三十岁时表达了对年长者的蔑视：“实际上，老年人没什么十分重要的建议能给予年轻人，他们的经验如此片面，他们的生活是如此糟糕的失败”[10]。在恐老厌老氛围笼罩下的美国文坛中，《嘉莉妹妹》对赫斯特伍德的衰老给予了颇多关注，其衰老加速了其健康状况与社会地位的恶化，构成小说发展的一大主线。

小说从赫斯特伍德的中年危机切入，他“意识到自己很快就会变老”，“缺乏年轻人内心喷涌而出的不竭希望”[7]（p.432）。小说叙述者秉持着“要么他越来越强壮、健康、聪明，就像少年快要成年的时候一样；要么他越来越虚弱、衰老、思维迟钝，就像人要步入老年的时候一样”的信条[7]（p.483），这样的二分法，将“虚弱、衰老、思维迟钝”[7]（p.483）、缺乏希望等归为老年人的特质，仍将衰老置于消极的框架内，并未跳离恐老症的窠臼。小说叙述者不止于呈现衰老的结果，而是关注衰老的过程。衰老之初，他的“眼神”不再如过去般自信敏锐，眼角皱纹加深，“脚步”不再“迅速、稳固”[7]（p.485）。衰老加剧，他“双目无神，满脸皱纹”，“头发也有些灰白了”[7]（p.637），步履蹒跚。

凯博文区分了“疾病”（disease）和“疾痛”（illness）两个概念，他用后者来指涉人们鲜活的、“难以避免的病患经验：可怕的症状、苦楚和困扰”，并指出病人病中的复杂“感觉和情绪是疾痛经验的主要成分”[9]。在《嘉莉妹妹》中，小说叙述者书写着个人独特的疾痛经验，关注病人病程中的复杂情绪，而非简单表征疾病症状。疾病伴随着赫斯特伍德的衰老接踵而至，他既遭受了急性疾病的侵袭，雪天的体力劳作使他患上肺炎，面色惨白、“浑身无力”之余，他更倍感“沮丧压抑”[7]（p.680）。同时他也饱受慢性疾病的困扰，诸如腿痛、胃痛、眼痛。寻觅工作的奔忙与步行使赫斯特伍德“两腿发软、肩膀疼痛、脚发疼”[7]（p.506），为了避寒和歇脚，他成了酒店门厅的蹭座者，激起了他“痛苦”、“沮丧和羞怯”的复杂情绪[7]（p.515）；街头流浪使他的腿痛进一步加剧，“他的腿在他坐下来时疼痛不堪”[7]（p.696）。赫斯特伍德的胃痛源于最初的节衣缩食与后来长期的饥饿和营养不良，极度的饥饿使他麻木疲惫、“充满挫败感”[7]（p.690），也“让他变成了懦夫”[7]（p.692），自尊尽失，祈求着陌生人的施舍。眼痛则源于他简陋的居住环境，只能在昏暗的灯光下阅读报纸，眼痛加重使他被迫放弃了读报的习惯，失去了了解嘉莉近况的唯一途径，加深了他的孤立无援之感。久而久之，身体各官能的崩溃最终导致了赫斯特伍德的精神紊乱，他的“头脑也不那么清楚了”[7]（p.724），“乞求着，叫喊着，跟不上自己的思路，想起这个就忘了那个”[7]（p.725）。赫斯特伍德后期饱受精神错乱之苦，桑塔格将精神错乱患者视为“太过敏感以致不能承受这个粗俗而平凡的世界”且充满恐惧的人[4]，是“有关自我超越的那种世俗神话”的表达[4]。赫斯特伍德的精神错乱正是物质主义席卷下资本主义经济剥削的产物，凸显了19世纪末的时代病灶。长期煎熬的慢性疾痛体验和消极情绪的困扰，使赫斯特伍德丧失了对健康和生命的信心，选择自杀。对病人疾痛体验和复杂情绪的关注，使得小说的疾病书写别具人本主义关怀。

3. 社会弱势群体：缺位的人文关怀

德莱塞曾在自传《一本关于我自己的书》（A Book about Myself 1922）中坦言，他困惑于现实世界与杂志、小说、文章呈现之间的大相径庭，文学作品中“一切都美丽、祥和、迷人，几乎没有提到任何粗俗、不雅、残酷和糟糕”[11]，于是他转而赋予社会底层群体声音，描绘他们在泥泞中的挣扎，披露世间的肮脏与不堪。《嘉莉妹妹》对底层工人的工作环境以及因此诱发的工人疾病予以关注。在一家名为斯贝捷海姆公司的制帽公司，嘉莉目睹了昏暗肮脏的工作场所，由于“长时间待在封闭的空间里”，女工们“面色有些苍白”[7]（p.36）。在嘉莉首次工作的制鞋厂，“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新皮子味道”[7]（p.55），地板上“满地垃圾”，盥洗室气味“污秽难闻”[7]（p.59），既无椅背又无脚蹬的凳子、高速生产的流水线使得嘉莉浑身酸痛僵硬，手部机械重复的工作使她头晕眼花、厌恶恶心。在赫斯特伍德作为电车司机的夜间休息室里，屋子寒冷，陈设简陋，卫生条件同样恶劣，“肮脏的被子”令赫斯特伍德感到恶心[7]（p.611）。电车工贼们“举止怪异，面带饥色”[7]（p.603），其中一个二十一岁的孩子由于贫困“身体单薄”[7]（p.609）。恶劣肮脏的工作环境滋生工人病痛，小说叙述者更直接谴责了资本对工人赤裸裸的压榨与剥削，“厂里的想法是给他们提供最少的报酬”，“但要从他们身上尽可能榨取最多的价值”[7]（p.59），传达着德莱塞对工业经济增长与相应劳工关怀严重脱节的敏锐观察与深刻谴责。

纽约街头的流浪者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典型代表。小说叙述者对流浪群体的病态亦有细致刻画，他们“个个面黄肌瘦，眼窝深陷，胸脯干瘦”[7]（p.716），有些脸“苍白没血色”，另一些人“脸上长了红疹”[7]（p.688），他们“眼睛都充满血丝”[7]（p.731），“嘴唇呈现出病态的红色”[7]（p.716），脸上、手指、耳朵“都生着严重的冻疮”[7]（p.715）。冻疮是皮肤长期暴露在潮湿寒冷环境中所致，红疹极可能是长期免疫力低下所致。他们食宿条件极其恶劣，饥饱不定，靠微薄的乞讨收入寄住在“昏暗肮脏的”、“满屋灰尘”的房间[7]（p.733）。流浪者的疾病与苦痛，根源仍在于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均和社会保障的缺位，德莱塞笔下弱势群体的疾痛经验因此成了经济剥削和社会正义缺位的反映。

19世纪末的纽约流浪者们面临如此恶劣的生存条件，却未能获得政府的妥善救济，1893年的经济危机导致大规模失业与社会动荡，“19世纪80-90年代的骚乱——失业的人、农民和罢工者在街头大战阶级敌人——导致政府采取了对乞丐更严格的政策。纽约市暂停了所有对贫困人群的公共救济，对公益事业的态度也转变了”[12]。赫斯特伍德曾目睹乞丐因沿街乞讨“被捕”[7]（p.682），自己也时常遭到警察驱赶和监视，乞丐的生活在政府禁令下更加步履维艰。《嘉莉妹妹》中，流浪者们收到的救济，都来自于私人施予，而捐赠者大多有基督教背景。“面包铺老板弗莱施曼”二十年来每晚为三百人发放免费面包。现场为数百流浪者募集资金解决当晚住宿的退伍上尉，是名“宗教狂热者”[7]（p.685）。为求助者发放免费午餐的“慈善姐妹（Sisters of Mercy）¹修道院传教所”内，“总会有一个身材高大、慈祥和蔼的女人守在门口”[7]（p.715），清点食堂可容纳的人数。不论是退伍上尉和面包店老板，还是妇女组织“慈善姐妹”，都基本停留在传统面对面慈善和私人赠与的范畴，并未走向科学化、体系化的公益事业。政府力量的缺席，以及公共救济和关怀的缺位，不仅无法满足流浪者的基本生存需要，更不可能在根源上解决贫困、骚乱等社会问题。

德莱塞对工人、流浪者等弱势群体寄予深刻同情之余，更试图探求社会诸多混乱与困境的根源所在。小说叙述者将浮华的上流社会与悲惨的底层民众并置，深刻揭露了工业经济高速发展下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与发展失衡。物质主义裹挟下，富人痴迷个人的寻欢作乐、追名逐利，缺乏相应的社会责任感，加之政府关怀的缺位，穷人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挤压。席卷美国的物质主义浪潮具有了流行病的部分特质，众人趋之若鹜的华丽酒店被比作“被昆虫侵扰的玫瑰”[7]（p.72），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横行即为虫害，是“对自然和生活的扭曲”[7]（p.70）。而纽约的纸醉金迷对初到者而言，“就像鸦片”对于健康身体一般[7]（p.431）。德莱塞以其敏锐的洞察力，直指19世纪末期美国的社会流弊，他对社会现实的真实剖白和对上流社会的尖锐批判，也开创了美国文坛新风，如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所言：“是德莱塞在美国小说中突破了维多利亚时代式和豪威尔斯式的那种胆小与高雅的传统，打开了通向诚实、大胆与生活激情的天地”[13]。

4. 结语

不论是个人疾病书写中对社会、情感因素的关注，还是群体疾病书写中对社会正义的诉求，德莱塞不断将个人病痛经验引向社会政治维度，这或与他赫伯特·斯宾塞学说的部分吸收相关，他“从赫伯特·斯宾塞那里得到身体的、社会的、心理的现实趋于机械的力量平衡的概念”[14]，并长期将斯宾塞奉为“其知识偶像”[14]，但《嘉莉妹妹》中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和对政府慈善缺位的揭露，无疑是对斯宾塞“社会有机体论”中淘汰贫穷病弱一主张的坚定否决。在德莱塞笔下，疾病摆脱了污名与耻辱，蜕化为政治批判的武器，传达着德莱塞对贫弱病痛者的深刻关怀，和以笔为利器、讨伐经济剥削的勇气。

注释

¹ “慈善姐妹”组织由天主教徒凯瑟琳（Catherine McAuley）和两名同伴于1831年成立于爱尔兰，首批“慈善姐妹”于1843年来到美国并不断壮大组织，“慈善姐妹”组织笃信基督教教义，致力于帮助贫困、生病、未受教育人群。

参考文献

- [1] SCHWEIK S M. The Ugly Laws: Disability in Public [M]. 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P, 2009: 2, 1.
- [2] 任姝欢. 美国镀金时代的贫困问题与慈善组织会社的“新式慈善”[J]. 山东社会科学, 2023 (8): 67-77.
- [3] 陈昊. 19世纪的英国与疾病 [M]//陈昊, 黄天颖, 姚孟君, 陈婧晋. 19世纪英国文学中的疾病书写.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22: 58.
- [4] 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M]. 程巍, 译.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3: 30, 31, 50, 34, 35.
- [5] 郭全照. 西方艺术中的忧郁图像志——从古代到文艺复兴 [J]. 外国美术, 2024 (9): 82-91.
- [6] 萨弗兰斯基. 叔本华及哲学的狂野年代 [M]. 钦文,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89.
- [7] 德莱塞. 嘉莉妹妹 [M]. 盛世教育西方名著翻译委员会, 译. 上海: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1.
- [8] RIGGIO T P. Introduction [M]//Theodore Dreiser. American Diaries 1902-1926.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3: 9, 3.
- [9] 凯博文. 病痛的故事 [M]. 方筱丽,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 18, 6, 31, 43.
- [10] FISCHER D H. Growing Old In America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114, 122, 113, 115.
- [11] DREISER T. A Book About Myself [M]. New York: Boni and Liveright, 1922: 490.

- [12] 克罗克:从赠与到基金会:罗素·塞奇夫人的慈善生涯 [C]//劳伦斯·J. 弗里德曼,马克·D.麦加维编. 美国历史上的慈善组织,公益事业和公民性. 徐家良,卢永彬等,译.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 135.
- [13] 郭栖庆. 作者介绍 [M] //德莱塞. 嘉莉妹妹. 北京:外国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2: 1.
- [14] RIGGIO T P. Introduction [M]//Theodore Dreiser. Dreiser's Russian Diar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6: 20, 17.